

她是“一位伟大的妇女”

刘少奇的严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是出了名的，但严肃并不等于无情，对同志对朋友他充满热忱，因此他与许多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就是一例。

早在二十年代刘少奇与宋庆龄就互相知晓。宋庆龄坚决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刘少奇十分敬佩这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也知道刘少奇是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领导人之一，对刘少奇参与领导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都曾给予大力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在近十八年的合作共事中，两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很融洽，建立了真挚的情谊。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当他抵达上海时，宋庆龄热情地邀请他和夫人王光美到自己家里做客。

宋庆龄亲手煮了咖啡招待客人。交谈中 宋庆龄得知刘少奇曾特意到南京中山陵敬献花圈时，很受感动。两人的谈话更加融洽，并由此谈到了孙中山先生。

刘少奇诚挚、尊敬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 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宋庆龄点了点头 恳切地说：“我一直相信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宋庆龄有什么愿望，刘少奇也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她达成。

1952 年 10 月，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会后，刘少奇因事留在莫斯科。在此期间 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也来到莫斯科。

宋庆龄见到刘少奇后，表示自己希望见到斯大林。刘少奇便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有一次，他同王稼祥去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会谈。交谈中 刘少奇向斯大林介绍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并建议斯大林会见宋庆龄和当时也在莫斯科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斯大林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1953 年 1 月 13 日，斯大林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

1957 年 4 月 刘少奇又来到上海。按惯例 同夫人王光美又去看望宋庆龄。

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当谈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时，刘少奇对宋庆龄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 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

宋庆龄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刘少奇又说：“共产党吸取了这个教训 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 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 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

宋庆龄越听越兴奋 她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 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

说完 她沉思了一会儿 好像要决定什么事。

突然 她抬起头 注视着刘少奇的眼睛 恳切而郑重地说：“我希望参加共产党。”

听到这句话 刘少奇非常高兴。但组织问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必须由党中央来决定。于是 他对宋庆龄说：“这是一件大事 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

时隔不久，刘少奇同周恩来到宋庆龄家。

寒暄过后 刘少奇认真地告诉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 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 我们党的一切大事 我们都随时告诉你 你都可以参与。”

此时 宋庆龄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她提出入党要求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蕴藏心中已久的愿望不能实现 她难免感到遗憾。但少奇的一番话真诚而又入情入理，表达了党中央对她的重视和信

任 她又非常感动。

心中百感交集 竟使宋庆龄一时说不出话来。她只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一直把宋庆龄当作自己的同志 党的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而宋庆龄也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

为此 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在关键时刻 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 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后来 在 1981年 5月 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决定 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使宋庆龄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刘少奇与宋庆龄不仅在工作上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在生活上也彼此关心 彼此照顾。

身为国家主席 刘少奇经常出国访问。宋庆龄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了一张单子 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 写了许多注意事项送给刘少奇。她唯恐自己写得不清楚，还派秘书去向王光美作详细解释。

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之前。宋庆龄得知刘少奇曾患肩周炎 还有肠胃病 就特别嘱咐王光美说：“到热带地区 不要贪凉 睡觉一定要关冷气 不要吃生冷的东西。”

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 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不畏强压 坚持革

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 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

同时 刘少奇也教育自己的孩子热爱宋妈妈。在父亲的影响下 刘少奇的几个子女给宋庆龄写信 送给她自己制作的贺年片、手工和图画。还应邀到宋庆龄家中去做客，给她讲述学校中发生的事情，为她表演节目。这种家庭式的聚会，给宋庆龄带来了许多欢乐。

友谊与相知，使宋庆龄坚信刘少奇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 她也丝毫没有动摇这一信念。

1966 年底，当时刘少奇已被称为“中国的头号走资派”宋庆龄却送给刘少奇一本《宋庆龄选集》 书中有这样一行手迹：“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一场浩劫终告结束，刘少奇冤案也得到了平反。1980 年 5 月，王光美要去河南迎接刘少奇的骨灰。宋庆龄派人给王光美送去了一些吃的和用的东西，并写了一封信。信中称王光美是“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并说：“一点小礼物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

“同志加兄弟”

1945年，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赶走了法国殖民者，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但时隔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步步逼向越南北方解放区。侵略者还勾结我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界，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边民的安宁，给两国人民带来很大灾难。

在国际上，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国向越南共产党提供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950年1月的一天，北京的天气十分寒冷。刘少奇独自一人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他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似乎在等什么人。

刘少奇住的院落原是清朝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刘少奇住进这里以后，把院中的东厢房作了办公室。这间房很窄小，有人建议扩建一下，刘少奇没有允许。

那天，室内的温度也不高，刘少奇身着一套黑色旧粗呢中山装。尽管只有五十一岁，两鬓的头发却已灰

白。

过了一会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走了进来。

刘少奇庄重而且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时间大约三个月左右。稍作停顿，他立即问罗贵波：“有什么意见？”

罗贵波虽然对越南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但这毕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他心里没底。于是，他开诚布公地回答：“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是一项我从未接触过的新工作，任务复杂而繁重，我担心难以胜任。”

“我们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了。

接着，他向罗贵波介绍了越南的形势。最后郑重地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防主义义务。”

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下达命令，罗贵波不能再犹豫了。

见罗贵波领受了任务，刘少奇又明确指示他，去越南的任务就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的关系，还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

当时还没有设立中央联络部，有关援越的事都须刘少奇亲自处理。包括罗贵波赴越后须与哪些部门、哪些人会见或建立联系，都是刘少奇一手安排的。

在刘少奇的亲自督促下，罗贵波带着一部电台和参谋、秘书、报务员、机要员和警卫员，一行九人于1950年1月16日启程赴越。

临行前刘少奇又找罗贵波谈了一次话。他指示罗贵波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共中央确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至于罗贵波与随行人员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领导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他关心地嘱咐罗贵波：路途漫长，交通不便，蒋军残部和当地土匪还时常骚扰，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最后，他拿起毛笔，写了一封致胡志明主席的介绍信。信上写道：“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八人。”署名：“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罗贵波一行尚在赴越途中，胡志明秘密地来到了中国。根据胡志明本人的要求，中共中央同意不公开这次访问。

胡志明到北京后，刘少奇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战友，并打电报向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电报中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十七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胡志明抵京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设宴招待了他。并同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解决胡志明要求援助的各项计划，倾听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同时，随时向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进行汇报。

由于胡志明希望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后，又做了周密的安排，把胡志明护送到了莫斯科。

1950年8月，应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中央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出援越顾问团，任命罗贵波为团长。

刘少奇向罗贵波发出电报指示：“目前中越两党的干部刚刚开始接触，相互之间还不很了解，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他们能够采纳多少，甚至不采纳，你也不应去计较。你只要以诚相待就行。而这一切是完全不能性急的。”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顾问团赢得了越南共产党的信任，成为胡志明的朋友，工作局面也打开了。

从1950年到1951年3月，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援越方针统筹安排，向越南提供了武器、弹药、粮食、油料等大量物资援助，并帮助越南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尽管当时我国的经济情况也十分困难，但为了贯彻党中央坚持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决策，刘少奇指示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力量调拨物资，尽可能满足越南共产党的要求。他强调：“所谓武器、弹药必须是合用的，

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所调拨的一切军需物资全是无偿的。”

有一次 越军作战部队缺粮 向中国告急 刘少奇指示两个省立即调拨。

当时有一个省提出 当地粮食自给都有困难 刘少奇坚决地说：“越南一些作战部队已发生断粮现象 我们不能见危不救！”

结果这个省克服困难，节省出一部分粮食如数运往越南。

在帮助越南共产党培训干部方面，刘少奇也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初，胡志明要求送二十一名学生来中国到高级党校学习 刘少奇立即批示马列学院负责安排。并提出 越南可以再派三十名学生来 凑齐一个班。

10月，越南要求送一批少年来中国学习。刘少奇为此与正在北京的越共领导人黄文欢交换了意见，提出：“越南儿童如果分散到中国各地学校去学习 由于不懂汉语 不识汉字 会给学校和越南儿童带来许多不便。如果由越方在广西办一个学校 校长和教员由越方担任 中国提供房屋、伙食及衣服等 这样可以用越文教课 同时也可学中文。等他们中学课程学完后 再分散到各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

后来，果然在广西桂林办起了一所越南育才学校。这所学校直至越南抗法战争胜利才迁到越南国内。

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中越两党、

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友谊的建立，离不开刘少奇的努力。在 1960 年刘少奇访问越南时，胡志明在欢迎词中说：“越中情义深 友谊加兄弟 ”表达了他对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尽管后来两国关系出现了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抵抗侵略者斗争的无私、真诚之心可昭日月。

名副其实的院长

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刘少奇十分重视党校的建设。从 1948 年到 1957 年，他曾直接领导过马列学院（即高级党校，后改名为中央党校）的工作。

早在 1948 年 7 月，党中央就作出决定：“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当时，解放战争处于大决战的关头，革命已胜利在望。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

这种形势转变，迫切要求一大批长期驰骋沙场的骁将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各方面的知识，迅速投入治国建设。

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的讲话中，都指出了通过办马列学院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重要意义。他说：“学习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对党和人民都很重要。”“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多理论干部，就不可能

领导这么大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

针对国内形势的转变 他指出：“理论是实践的指针 没有理论 工作就是盲目的 无前途的 无生命的。有些人不懂理论 又要站到指挥台上 成吗 不成的 现在还可以 以后就不成了。”这些话 至今听来仍有现实意义。

7月底，马列学院的筹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

筹办一个党校 面临许多实际问题 如 寻找校址、选调工作人员、招生条件、考试题目、录取学员数额等。刘少奇不嫌工作琐碎，都亲自参加研究确定。

8月中旬，他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 自拟一篇 写自己最熟悉、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他还开列了第一学期的课程 并同大家初步商定了授课教员的名单。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8年11月8日 马列学院第一期在河北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了。

开学后 刘少奇亲自到校给学员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广泛 从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到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员的个人修养，言之有物，语重心长 学员都感到收益很大。

刘少奇特别针对当时学员中存在的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反复阐述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对今后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意义，启发学员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 提高了大家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学员深

有感触地说：“少奇同志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院长。”

刘少奇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近五年，虽日理万机，但对党校工作，无论大小，都很关心。有一次，一个学员被开除学籍，宣布这件事的布告，他都亲自做了修改。

1951年5月，刘少奇指示马列学院扩大招生，要求校委提出校舍建筑方案。针对时间紧、经费不足的情况，他亲自规定了校舍建筑的原则：“建筑标准以在延安和西柏坡时的建筑为原则，稍加一些改良和计划性即可，即以合卫生、不冷、能住人、便宜、迅速为合格，并准备在十年之后再建筑正式校舍。”

后来，他又当面对杨献珍（当时任马列学院副院长）说：“扩大招生不能不盖些房子，但目前国家财政比较紧，不能拿出多少钱来盖房子，可先盖些简易的平房，以后国家财政宽裕了，再建筑现代化的校舍。”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一批节约耐用、居住便利的平房校舍很快建成了，既节省了资金，又满足了扩大招生的需要。

刘少奇不仅重视党校建设，对在党校工作的同志也很关心。

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时，有的领导同志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逼供信，把刘元士（当时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打成了“大老虎”，说他有贪污行为。

这件事作为经验，传遍全国，在当时影响很大。

后来，经过认真查证，发现刘元士并没有贪污行为。校委的同志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刘少奇当即批评他们说：“你们既然知道刘元士没有贪污，为什么不顶住，我们不能容许这种违犯党的原则、不实事求是的事发生！”

因为一个好同志受到了诬陷，也因为这件事流传太广，刘少奇激怒地说：“对于这种荒唐事，就是要一膀子抗住！一定要一膀子抗住！”

接着，他又派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到马列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帮助马列学院检查总结，并对直接领导这次运动并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从 1952 年春季以后，刘少奇不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职务，但他仍然关心着党校的建设与发展。

1953 年春天，我国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

这种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更加重要。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马列学院提出了扩大招生的新任务：成立两个学员部。第一部专门培养高等院校和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员；第二部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干部。

4 月，校委经过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提出了扩大马列学院的具体意见。刘少奇亲自批示“同意所拟各项意见”，并指示校委：“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将马列学院各项问题提交中央会议上作一决定。”

5 月，校委上报了《关于马列学院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向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

不久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马列学院的各项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55 年，马列学院改名为高级党校，选定了新校址 拟定了建筑计划 报请中央审批。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讨论这个计划时 都表示：“高级党校的房子要盖好一点。”高级党校要办好，房子也要长期打算。”

在他们的关怀指导下，高级党校的新校舍在六十年代初竣工并投入使用，这就是现在的中央党校。

支持海军建设

1951年冬天，为加强我国海军建设，海军党委从抓干部入手，决定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将士中，选拔三百名战斗英雄模范，培养出一百套潜艇干部。

海军党委的同志把这件事向罗荣桓（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部长）作了汇报。

罗荣桓当即高兴地表示赞同，并指示这件事还要向中央报告，最好先去找刘少奇同志汇报，因为刘少奇当时是党的副主席，分管组织干部工作。

经过联系，海军党委的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当晚去刘少奇家面谈。

晚上7点钟，这位同志乘车来到中南海。门卫有礼貌地将他请进刘少奇家。

得到通报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热情地出来迎接，并说：“少奇同志正在等你。”随后领客人来到会客室。刘少奇一见客人进门，立即站起身，亲切握手，招呼奉茶。

会客室布置得简单朴素，只有几个沙发和一个茶几。在这种环境中，客人一点也不会感到拘束。